

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李炳海 赵敏俐 主编



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李炳海 赵敏俐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杨公骥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 李炳海, 赵敏俐主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77 - 3827 - 8

I. ①纪… II. ①李… ②赵…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6. 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6896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方晓喆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 31.75 印张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

目 录

“二重证据”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	傅道彬/1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刘跃进/10
20 世纪唐诗研究的几点反思	吴相洲/26
论晚唐五代“齐梁体”诗歌的体格特征	杜晓勤/36
论词体的徒诗化进程	钱志熙/46
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演变	左东岭/66
明代宋玉作品的真伪考辨与辑佚及其对传播的影响	刘 刚/82
赵执信与清初诗学之终结	蒋 寅/92
五十年的追问:什么是戏剧? 什么是中国戏剧史?	康保成/103
青闺夜照团圞月 ——朱素臣《秦楼月》传奇写作与刊刻的前因后果	郭英德/114
聪明捷敏 人之美材	
——读《左传》札记	傅庆升/135
周诗中所反映的宠幸之祸和亡国之痛	冯克正/142
《周颂·有客》与周代宾礼	姚小鸥 李文慧/149
周人颂美女祖诗歌的文化解读	杨 允/156
《左氏春秋》叙事的文化超越品格	单 良/163
《逸周书》编著意图考论	赵奉蓉/171
缺失环境中凸显的完美	
——屈原品格与战国士精神	吕书宝/182
诗言志与先秦的言意之辩	张庆利/194
上博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的诗教思想	梁大伟/207
汉代琴曲歌辞与五言诗的关系	高长山/215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艰难抉择	
——汉代三篇“设论”赋的细读	刘国民/220
论汉代边塞简牍的文学文献价值	龙文玲/230
歌诗演唱与相和歌辞艺术的原生态考察	王传飞/244

《汉书》完成过程考	
——兼论刘之遴所校《汉书》古本真伪	李 艳/256
论汉末建安诗文的“迁逝”之悲	刘国民/265
审美与哲理的会通:论两宋理学诗的诗性品格	王培友/278
慎思明辨的学术典范	
——杨公骥《商颂考》评析	赵敏俐/299
杨公骥教授《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的注释特色	姚小鹏 孟祥笑/317
关于《巾舞歌辞》研究的公案	姚小鹏/324
《巾舞歌辞》研究综述	王克家/339
一部不该被遗忘的著作	
——重读杨公骥先生《西藏古史考》	郭 杰/365
探索文学原初动力的典范	
——学习杨公骥先生《中国文学》的体会	杨 允/370
视野宏阔 论断透辟	
——杨公骥先生《中国文学》中“战国时代的历史散文”学习札记	单 良/375
师门琐忆——深切缅怀杨公骥先师	周 蒙/382
怀念公骥师	彭治平/396
怀念杨公骥先生	方 铭/401
学术芳草园中的树兰滋蕙	
——杨公骥教授研究生培养理路举要	李炳海/407
回忆杨公骥先生给博士生上的第一堂课	
——附 1982 年 9 月 20 日讲课内容记录稿	孙绿怡/418
卓识高节 风范千秋	
——从公骥师的几次教诲谈起	许志刚/426
一位始终不渝追求真理的学者——杨公骥教授	杨树增/437
独具个性 执著求真	
——怀念我的导师杨公骥先生	赵敏俐/459
自传及著作简述	杨公骥/480
编 后 记	/500

“二重证据”与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

傅道彬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25)

大学的时候读过杨公骥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30多年过去了,书中许多见解还记忆犹新。与一般的讲义式的文学史著作的写作方法不同,杨先生的文学史写作方式是建构在翔实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土壤上的,在他的著作里不是作者的简单介绍和文学历史的一般描述,而是议论纵横目光独到的思想家的风采。在分析《诗经》“二拍子节奏”的时候,杨先生在描述中国上古诗歌普遍存在的“二拍子结构”的现象时,却将笔锋一转,指向这一结构形式产生的生活和社会基础:

在原始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比较单纯,生产技术比较幼稚,从而劳动动作也比较简单,其节奏大多是一反一复。由于对一反一复动作的适应,在原始诗歌中最初出现的大多是二拍子节奏。这种二拍子诗,是诗的原始型,曾出现在各民族的原始文学中。我国《诗经》中的诗大多袭用了二拍子节奏。^①

我国上古诗歌以四言二拍子结构形式为主体,例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伐木/丁丁,鸟鸣/嚶嚶”等,大都是上古诗歌“二拍子”结构的经典形式。但是人们很少将其与劳动的节奏联系起来,杨先生却目光独具,认为诗歌的节奏与原始劳动的韵律是一致的。劳动动作一般是一往一来两个行动组成。以打制石器为例,举锤时用力轻而无声,下去时力重而有声响;音响发生于第二行动之尾,也就是劳动动作节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劳动诗大多是二节拍(四言)之尾押韵。^②他在寻常的文学形式中,寻找出朴素劳动生活的深刻影响。比起一般文学史“劳动创造文学”的泛泛论述,杨先生的论述更

①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第8页。

② 杨公骥:《“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影响》,《文史知识》1986年5期。

根植于历史,根植于材料,也根植于深厚的理论修养,没有良好的理论训练是很难有如此富有创造的学术见解的。

学术研究中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夸大研究对象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以屈原研究为例,历史上屈原确实曾支持过联齐抗秦的思想,以对付张仪之流秦楚和亲的主张。本来楚国究竟是实行“合纵”还是“联横”的政治路线,是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的,绝不是仅仅凭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能左右的,也不仅仅由于楚怀王不听信屈原的劝告那样简单。但是在一些学者研究中,由于对屈原的偏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屈原的政治地位,夸大了屈原所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却得出了几近荒唐的历史结论。对此杨先生不无揶揄地写道:“楚怀王如果是聪明人,如果能听信屈原的话,杀掉张仪,采取联齐反秦的政策,同时不入武关与秦会盟,那么,楚不仅不会灭亡,甚至能灭秦和其他五国,完成统一大业。这就是说,如果楚怀王肯采纳屈原的意见,那么中国历史将会走另一条道路,《史记》将出现一篇《楚本纪》。”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就不取决于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历史动因,而取决于几个谋臣、几个大夫的骗术伎俩和口舌之利,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屈原之所以失败,历史发展之所以‘不幸’,是由于骗子张仪收买了财迷上官大夫做内奸,拉拢了妒妇郑袖做帮手,共同欺骗了傻瓜楚怀王。于是乎,人们在欺诈、贿赂、嫉妒、愚蠢的支配下相成相因地创造了历史,而《史记》中便出现了《秦本纪》”。杨先生以深刻的理论目光审视战国时期的历史变化,看到了在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历史成因,不论是秦王的野心,还是楚王的妄想,不论是张仪的诡计,还是屈原的信念,都不能成为决定秦楚兴亡这一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秦的新兴、楚的衰亡并不是楚怀王性格上的弱点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秦的新经济制度的必然兴起和楚的旧经济制度的必然灭亡这一历史规律,楚怀王才不能‘福至心灵’,才让自己的愚蠢加速了自己的失败。显然,战国时代诸国的兴亡并不是侯王的贤愚决定的”。^① 杨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固然有着丰厚的文献基础支撑,而让他真正与那些掉书袋子的冬烘先生区别开来的还是他理论的犀利和思想的洞彻。

缺少理论意识一直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痼疾,张舜徽先生在研究清代学术时时常常批评乾嘉以来琐屑细碎的名物考证,没有了思想的统贯,失去了精神的关怀,所谓考证只是少数人书斋里无聊的游戏,其根本是背离科学精神的。五四以来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也眼界大开。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理论思潮波涛汹涌,涤荡陈旧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但是这样的理论繁荣,其弊端也

^① 杨公骥著,杨若木选编,《杨公骥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55页。

是十分明显的,即在概念内盘桓而忽视知识的支撑,其空疏浮躁的风气也渐渐为人所诟病。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风气骤变,人们开始质疑这种空洞理论的意义,“去理论化”,重视所谓考据资料,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人人以考据为荣,考据甚至成了一些浅薄之徒的学术遮羞布,冗长的引文,繁琐的资料堆砌,没有思想统贯的所谓考据,已经让学术渐渐失去了精神的血色,而变得苍白贫弱。文学研究也失去了杨公骥式的犀利和洞彻,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的退步。

眼下学界热衷于谈“二重证据法”,其实“二重证据”本身也是富有理论意识和精神关怀的,而不是简单的文献考据。“二重证据”出自王国维《古史新证》——“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按照王国维的理解,古来新学术的发生大都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20世纪学术开始的前10年里,地不爱宝,天赐机缘,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资料的出土和发现,为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做了资料准备,使得中国学术眼界始大,境界始宽,出现了革命意义上的变化,运用地下考古资料证明历史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学术最重要的突破。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二重证据”来评判王国维的学术意义还有失褊狭。首先,所谓“二重证据”并不起于王国维,宋代以来金石之学已广为流行,欧阳修所著《集古录》以开启了采摭金石遗文推明经史遗义的先河,顾炎武等前辈学者在以金石证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次,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也不仅仅限于“二重证据”,除了新资料的运用,王国维吸取外来思想与观念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学取得的学术成就更是值得注意的。有意思的是,对王国维有深入理解的陈寅恪不是以“二重证据”而是以“三重证明”来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陈寅恪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伟大獫狁考》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②这里的“三重证明”更能全面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于“二重证据”之外,陈寅恪更注意王国维在吸取异民族史料与汉民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2页。

^②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47页。

族史料相互印证,吸取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互发明等方面取得的历史贡献。“二重证据”绝不仅仅是考据证明的乾嘉余绪,而是融入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目光”审视下的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

事实上王国维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哲学起步的,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是《哲学辨惑》(1903),年轻的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和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与哲学的人,王国维自述其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1901),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①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春,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今岁之春(1905),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②从王国维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最初走向学术道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的兴趣中,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固然得益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学术功力,而也是其现代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

王国维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深受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启发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他将文学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哲学、伦理学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与观察视角,使古典文学研究从经院考据和即兴式欣赏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格与气象。王国维自谓《红楼梦评论》,其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在王氏看来,《红楼梦》是“宇宙之大著述”,是“悲剧中之悲剧”,以悲剧的眼光看待《红楼梦》体现出迥异于传统的学术眼光,也是为现代红学做了精神的奠基。《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的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等文学思想中,都明显看出“中学西学”“互相推助”的印记。

虽然王国维后来深深受困于“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③,学术兴趣渐渐“移于文学”,辛亥革命以后,更是把专注于以“二重证据”为特征的历史学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看到王国维深刻的理论意识和“小处见大”的学术眼光。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王国维把殷卜辞中的“王亥”,与《山海经》《竹书纪年》中的“王亥”比较,认为王亥实为殷人先公。《世本》之“胙”、《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之“垓”,实为一人。从这样的考据出发,甲骨文字的意义就不仅仅

^① 汗德(Kant),今译为康德(1724—1804),德国著名哲学家。

^② 《静庵文集·自序》,载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331页。

^③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载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611页。

是文字学的,而是历史学的,王国维的考据证明了《史记》中殷商世系的记载不是“传闻”,而是“信史”,由此得出以往不被人重视的著作,如《山海经》《天问》《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著作的历史价值,“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①。陈寅恪先生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②,王国维从一个普通的甲骨文字的辨识出发,转入对一个殷商先公的考察,继而引申到对殷商先王世系的认识,推及到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认识以及殷周典章与文化制度的探究,虽然这是典型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但是这里仍然包含了超迈常人的学术见识和理论境界,“二重证据”的历史收获是以跨越民族本位的立场和融汇中西的视野为基础的,这绝非一般琐屑之考据者所能达到。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王国维“二重证据”的学术成就时,不能忘记他早期对哲学对理论所作的深入研究。“二重”与“三重”虽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学术境界的重要区别。

王国维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对于传统的考据之学有着深入了解,但是他同时也有着目光远大的卓越见识,他熟谙传统,也深知“治旧学者”之弊:“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愚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不过如商彝周鼎,藉饰观瞻而已”^③,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接受外来哲学与文学思想浸染的青年一代,以为“即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旧者矣”^④。王国维并不像一般意义的坚守传统的文化遗民一样表现出对西方与现代思想的排斥,相反却对国学研究的复兴寄希望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学与哲学思想。王国维固然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但是他却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的进步理论,他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⑤王国维不是把新学旧学中学西学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对立起来,而是融汇一起泯灭界限消除滞碍,尤其是他认为中学西学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化合”,一盛俱盛,一衰俱衰,共同发展,这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年代正是新学旧学中学西学正处于艰难磨合期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充分展示了他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开启风气的大师风采。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一方面吸收输入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53页。

②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沈兼士》,三联书店,2001,第172页。

③ 《教育小言十则之十》,《王国维遗书》(三),第676页。

④ 同上。

⑤ 《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三),第204页。

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学术主张和中西古今相互“打通”的学术精神,都明显看出王国维深刻的影响。

“三重证明”超出了对王国维个人学术的评判意义,而具有对20世纪学术史的总结意义,所以陈寅恪认为王国维“释证”“补证”“参证”的三类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①20世纪学术的重要突破,一是新资料的发现与解读,以新材料发现为基础的敦煌学、甲骨学、档案学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二是新的学科的建立与拓展,学术突破了传统经史学科的限制,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美学等一连新学科的建立丰富了20世纪的学术殿堂;三是新的理论与观念的引进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哲学、实验主义、存在主义等诸多思想应用于传统文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在20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行列中,如梁启超、吴梅、胡适、鲁迅、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闻一多、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郭沫若、钱钟书等等,无不受到了新的学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无不具有学术方法的创新,比起新资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更刺激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如果说新资料的发现还带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偶然因素的话,理论批评的广泛运用却是历史的必然和自觉选择。而在20世纪学术取得成就的各个方面,“人们处处会发现王国维”^②,因此即应该注重王国维“二重证据”的学术贡献,也应注意他“转移风气”意义的哲学突破和理论建树,这正是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三重证明”的意义所在。

二重证据,还是三重证明,对当下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1990年以来中国学术发生了重要转向,思想的锋芒渐趋收敛,理论的热闹归于沉寂,代之而起的是国学研究的兴盛,考据手段的普遍运用和学术规范的强化。本来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热闹非凡的也颇有些浮躁的理论界,提倡务实的沉潜的合乎规范的科学精神,是应当的,是符合学术发展方向和历史趋势的。但是,常常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对理论与方法的躁进批判的同时,轻视理论忽略问题的倾向也渐渐增长。许多场合一些人把哲学与理论的运用描绘得相当不堪,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仿佛成了浅薄与浮躁的同义词,甚至于一些在80年代理论盛行时颇为热闹的一些学者,也没有了当初雄睨天下的自信,而矮子看戏,随人短长,虽然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却也曰考曰证,好像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② 刘焯:《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第400页。

一下子变得深刻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思想来路与精神出处。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往往只注意其“二重证据”的历史成就,而忽略了以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创新精神,忽略了“二重证据”取得的学术突破是以“取异族之故书”和“取外来之观念”的开阔意识和理论境界为前提的。

80年代以思想解放为特征的理论启蒙运动,尽管留有许多遗憾,但是这场理论启蒙的背景是由于“十年动乱”的思想禁锢而引发的,正因为理论启蒙廓清了前行的道路,我们才能重提乾嘉,重提考据,重提规范,重新提起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一系列学术大师的学术贡献。应该看到,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80年代各种思想、方法、理论的引进,仿佛出一个经历了长时间饥饿的人,突然有了大量的食物,表现得相当的饕餮,一时间狼吞虎咽,饥不择食,理论阐释中的粗疏简单常常为人所诟病。但是这仍然不是学术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淡化甚至放弃理论的理由,恰恰相反,理论阐释的简单粗疏正说明理论研究应当坚持下去深入下去,使之更精细化更科学化,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杨公骥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坚实厚重的文献考据,更有超乎常人的理论见识和思想洞察力。

杨公骥先生是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学批评的理论精神的,他曾经以《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近代“纯学术”的考证学》为题,奚落那些“小市民摆龙门阵”的所谓考据和研究。据传说,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想到地球的引力,瓦特看到热水沸腾顶起壶盖而发明了蒸汽机。但是,那些标明考据的“纯学术”的学者们,他们不去探索和研究万有引力定律和蒸汽发动机的原理,却深入细致地去考证牛顿看到的苹果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那个苹果最终被谁吃了,瓦特使用的那把水壶是铜水壶还是铁水壶、锡水壶,它是花几先令几便士从伦敦哪家店铺买来的。使用这种考据学来搞文学史,则更容易有所发明有所创见有所突破。巴尔扎克因赌博而拼命写作,这样赌博就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动力,依据小小的实证,推演出大结论,或考证古人之隐私,或考索文坛之佳话,“其用场不外是,或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或作为‘余兴’点缀报刊,或作为课堂上的‘抗眠剂’用来兴奋一下大学生们的脑神经。当然,在学术论文中,也可以把这些考证出来的奇闻趣事作为增彩生光的点睛之笔,或用作震动全局的原子之弹。”^①而令人忧虑的是,今天这样的“纯学术”考证不是减少,而是纷纷然更多。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孙悟空的花果山坐落于何地,西门庆的籍贯在哪里,曹雪芹是胖子还是瘦子等等,钩沉稽佚,不一而足,将收集来的“小道消息”,当作学术发现推广,“它和考证牛顿的苹果或

^① 杨公骥:《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近代“纯学术”的考证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5期。

瓦特的水壶同属一家风”，是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的。

理论意识的淡化带给文学研究的弊端是问题意识的缺乏，以古典文学的研究为例，在各种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主题相近观点相近材料相近甚至于语言都相近的所谓研究，许多80年代甚至是五六十年代早已熟知的问题，诸如某某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某某作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某某时代的艺术成就等等，早已是老生常谈，而在一些研究文章里还仍然谈论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在人人讨伐学术失范的时候，不应忘记平庸与重复比起学术的失范更有害于学术的进步。

许多学术的失范表现为技术层面，而问题意识的匮乏而带来的无意义的重复则表现为学术的精神空虚。晚明时期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顾宪成、顾允成等人曾经激烈地批判当时讲学之弊：“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①这样的批评用来评论一些扎堆式的所谓研究也颇有道理，唯以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文章为目的，全然没有问题意识创新精神，虽然造成了学术数量激增的假象，却不能掩盖质量的平庸和贫弱。古人论学以识见为第一要义，识见即是观察能力、判断能力、辨别能力、预见能力，即是一个学者的哲学修养和理论视野，也就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识见在学术研究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使是考据之学，也应以足够的见识为前提。热衷考据的学者好言乾嘉，其实乾嘉一代学者不仅仅是提倡“无证不信”“孤证不立”的考据规范，更有立足小学通经明道的问题意识。戴震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②，乾嘉朴学之所以以小学考据为根基，从文字到语言从语言再到“圣贤心志”，其目的还在于对精神的追求对道的关心，考据承载着乾嘉学者通经明史的精神关注，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考证手段。乾嘉的这种精神也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一代学者所继承，钱穆先生著作宏富而又精于考据，而他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复兴中国学术传统和活泼精神的使命，在他看来“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③，只有承担使命与关怀，学术研究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生命力，没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和考证，至多是少部分人的文字游戏，却是真正的学术空疏。

当然所谓理论所谓问题，应当是以知识与学问为基础的，离开知识基础的所谓理论创新，理论会变成空理论，问题会变成伪问题。张舜徽先生批评李贽是“史识极高，议论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卷六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本，第475页。

② 《戴震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0，第146页。

③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第156页。

有绝佳处,所憾他读书不多,见人不广,识有余,而学不足以相济”^①,见识是第一要义,但这样的见识,应当是学识相埒,以“学”养的“识”,否则“识”就演化成了空论。80年代的理论热方法热,也确实有“识有余而学不足以相济”的遗憾。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从理论追求中淡出,而应成为深化理论的理由。

王国维“三重证明”留给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文学批评应当有新的学术眼光的,无论是新材料的发现,还是传统材料的开掘都是如此。同是国学大师,同样面对甲骨史料,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的历史研究方法,而章太炎则根本否认甲骨文存在的意义。第二,文学批评应当提倡新的学术方法和新的学科的运用,不仅注意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也应注意超越民族的语言文化文化研究;不仅注重本学科的研究,而应注重多学科研究手段的运用。第三,文学批评需要新的理论和思想的支持,善于吸取外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在比较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使古典文学的研究具有新鲜的气象,因此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是不能淡化的,这在今天具有特殊意义。以王国维为代表的20世纪的前贤们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杨公骥先生们也做出了许多成绩,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道路,至少不应倒退。

作者简介:

傅道彬,男,1960年生,山东阳谷人。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在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过《诗可以观》、《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等著作。

^① 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第192页。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一)关于王羲之的生平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今山东诸城一带)人。其父王旷始创元帝过江之议。过江后,家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羲之13岁时为周顗所异,善隶书、行书。起家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迁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召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就,拜右军将军,求宣城郡不许,乃为会稽内史。《晋书》本传称其“年五十九卒”。^①题名陶弘景《真诰》卷十六《阐幽微》注:“逸少……至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②余嘉锡引此曰:“《真诰》虽不可信,而隐居之注,考证不苟,必有所据。”^③唐人张怀瓘《书断中》亦云其“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④据此,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303),卒于东晋升平五年(361),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平议》^⑤另载三说:

其一,《太平广记》二百七引羊欣《笔阵图》曰:“王羲之三十三书《兰亭序》。”据此,宋桑世昌《兰亭考》推其生卒年为东晋大兴四年至太元四年(321—379),钱大昕《疑年录》、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同此说;

其二,据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时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① 《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102页。

② 《真诰》卷十六《道藏要籍选刊》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661页。

③ 《世说新语笺疏》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第632页。

④ 《法书要录·书断》,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266页。

⑤ 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第1页。

书。”则生卒年为西晋光熙元年至东晋兴宁二年(306—364)；

其三，鲁一同《右军年谱》以为西晋永嘉元年至东晋兴宁三年(307—365)，潘祖炎《王羲之生卒年辨证》同此说。

据王羲之书法作品一直为后世所重，《宣和书谱》载当时御藏书作243幅。现存《淳化阁帖》卷六、七、八载其书160帖。其著述，《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羲之集》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其《小学篇》一卷。严可均辑其文五卷，包括杂帖在内凡二十七篇。逯钦立辑其《兰亭诗》二首、《答许询》一首。

(二) 围绕《兰亭集序》的论争

《兰亭集序》的文字，有两个版本，一是收录在《世说新语·企慕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①

另外就是现今最为流行的版本，最早收录在相传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晋书·王羲之传》，称其

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

^① 《世说新语笺疏》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第631页。

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①

围绕着这篇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争：

第一，这篇作品是王羲之写的吗？这篇文字未见载于萧梁时代的《昭明文选》，实际上，《文选》分别收录了同类作品，包括颜延之和王融的两人分别撰写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辞艳丽，典雅庄重。王羲之也有类似的作品，即《世说新语·企慕》注引《临河序》，但是很短。比世传《兰亭序》少“夫人之相与”至“悲夫”为止的167字。《初学记》卷四、《艺文类聚》卷四所引都止于“信可乐也”，亦无这一百余字。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你会鲜明感觉到，如果缺少这段文字，就少了很多神韵。问题由此而来：这段文字是原来有而为刘孝标所删节呢，还是本来就没有？相信《兰亭集序》真迹为王羲之所作的人，自然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是后者呢？是何人所加？从目前资料看，这段文字最早见于《晋书·王羲之传》，由此可以确定，至少是在唐太宗之前就加进去的。《临河序》虽然没有《兰亭集序》中间这段文字，但是文末却又多出以下40字：“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里可能会有两种解释：

一是《兰亭集序》不符合《文选》强调的“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收录标准，完全是散文体。同样是这类作品，颜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骈丽典雅，当时

^① 《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099页。